



頭路

新加坡福建人的行业

目录



	序	5
	导言	6
第一章	物畅其流 海纳百川 — 转口贸易	15
第二章	远洋辟路 内河沧桑 — 航运与驳船业	33
第三章	金融服务 营运有方 — 银行业	61
第四章	人生祸福 绸缪保障 — 保险业	81
第五章	信通桑梓 批惠侨乡 — 批信业	93
第六章	黄梨橡胶 耘苗垦荒 — 种植业	109
第七章	砂石砖瓦 五金枋廊 — 建筑行	139
第八章	人力车渺 巴士登场 — 交通业	161
第九章	梨园献艺 余韵绕梁 — 文化娱乐业	187
第十章	事业头等 功夫顶上 — 理发业	205
第十一章	薄饼面线 羔丕飘香 — 饮食业	217
第十二章	茗中有话 味甘情长 — 茶庄	239
	鸣谢	250



20世纪50年代的厦门街（Amoy Street）

序



黄祖耀
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

早期的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，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，从中国南下过番的移民与日俱增。很自然的，许多飘洋过海的新客在抵步时都会寻找乡亲们的协助与支持。由于他们的族群观念极其强烈，许多行业都只“内传”给同乡亲人，造成某些方言社群与一些特定行业的关系密不可分。人们在提到某个方言社群时，自然会立刻联想到相关行业。

当时的新加坡，赤贫落后，它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然海港。从四方八面到来寻找“头路”（闽南话指工作或职业）的过番客，很多是赤手空拳，只凭着一股不言败的精神南来闯天下。他们靠勤奋和毅力，一点一滴累积财富，建立一番事业，体现了福建人的拼搏与不屈不

挠精神，也奠定了新加坡今日的经济发展的根基。

随着生活日渐安定、经济日渐繁荣，这些先人开始以各种方式回馈社会，其中广为人知的福建先贤有陈笃生、陈金钟、陈嘉庚、陈六使、李光前等。他们许多不单是成功的商贾，也是德高望重的社群领袖，他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，热心公益贡献社会。

《头路——新加坡福建人的行业》不但记录了福建人在各行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行业的发展，更是希望先辈的成功事迹，能为后人树立典范，成为后人的楷模，继承并发扬先辈们那股顽强拼搏的毅力和热心社会的精神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出版小组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发行，并祝愿各位阅读愉快。

导言

崔贵强

福建地处中国南方，西北与北部毗邻江西与浙江，西南依傍广东，东部与南部濒临东海，隔着台湾海峡与台湾遥相对望。境内多山少田，山地与丘陵地约占全省面积95%，平地则约只占5%，多集中在沿海平原地带。河川多急流险滩，交通不便，福建自然环境恶劣，民生艰苦，不过这也孕育了福建人吃苦、勤俭与拼搏的精神。

福建海岸线漫长而曲折，提供了丰富的海洋资源，有利于航运与渔业发展，并造就了优良的海港。自唐（618–907）、宋（960–1279）、元（1271–1368）以来，泉州即已成为繁荣的商港，各国船只辐辏，万商云集。明（1368–1644）、清（1644–1911）之际，继之而起的商港有月港、厦门与福州等港，明清初期推行海禁政策，闽商以利之所至，不惜以身试法，从事走私与海盗活动，沿海贸易依然持续增长。随着移民的移殖海外，上述商港也就成了移民的落脚点。

自明朝中叶以后，福建沿海居民向海外移殖，移民浪潮涌向台湾和日本。与此同时，闽南人先民迁移到东南亚各地。1613年，在葡萄牙人统治下的马六甲，已出

现了漳州村。政府特委任郑芳扬（漳州人）为甲必丹，协助政府解决华人间的纠纷，并将罪犯绳之以法。嗣后荷兰人统治马六甲期间，亦委任李君常、曾其禄、陈承阳及蔡士章等人充当甲必丹，他们原籍都是闽南。

迨至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，便有华人蜂拥而来，一部分是来自马六甲的闽南人，而华南（闽粤）移民也细水长流地注入。开埠后的首两年间，即有中国帆船远来泊岸。1821年2月18日，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航抵新加坡，可能运来了中国移民。由于中国移民人数众多，英殖民地政府便委任陈浩盛（Tan How Seng，从其英文名字的拼音，推测可能是福建人），协助政府处理华民的事务。

自鸦片战争爆发（1840）后，新加坡华族移民激增，这种飞跃式的趋势持续不断，华人人口随着岁月的推移作倍数增加。仅仅在1871–1901的30年间，就激增了10多万人。进入二十世纪上半叶，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（1914–1918）及世界经济大恐慌（1929–1934）期间，移民浪潮稍受阻遏外，其他时期的移民人数倍增，其中尤以1926年与1927年为甚。



就方言群体的人数而言，闽南人一直高居榜首。在二十世纪首40年间，闽南人依然独占鳌头。据1931年的人口统计，闽南人占全华人人口的43%，几及半数。这种优势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依然不变，据1970年的新加坡人口统计，福建人（666,944）占华人全人口（1,579,866）的42.2%。

早期的福建移民，飘洋过海，一穷二白，初来乍到，只能充当劳工、小贩或店员，但凭着勤俭吃苦的精神，假以时日，便累积了些少资本，然后转变行业，扩大经济活动的领域。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，新加坡华人（包括福建人）的职业囊括了士、农、工、商各业，约有110多类，形形色色，多姿多彩。

新加坡很早即确立了自由贸易港的地位。它位于东西海上的枢纽，扼马六甲海峡的咽喉，迅速地成为东西国家货物集散地。后方腹地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（印尼），是货物供应地与消费品市场。另一方面，莱佛士一开始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，对外国进口货品减免税收，配额不受限制，吸引了各国商贾前来经商。

长期以来，转口贸易是新加坡经济增

长的动力。尤其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，由于苏彝士运河的通航，大大缩短了欧亚的航程，刺激了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额激增。1900年以后，由于马来半岛与印尼的橡胶与石油，经新加坡转运欧美各国。与此同时，欧美各国、中国及东南亚邻近国家也与新加坡加强了贸易纽带，使新加坡益趋繁荣。五十年代以来，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持续增长，尤其是独立建国（1965）后，在政府与资本企业集团积极经营发展下，进出口贸易额更上一层楼，新加坡商港的现代化设备与服务，更使它跻身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商港。

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增长，及城市国家日益繁荣，给长袖善舞的福建商人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。百多年来，在促进转口贸易的过程中，闽人成了不可或缺的出入口商，扮演了桥梁的作用。他们在各地建立了商业网络，通过圆熟的手段，把马来亚与印尼的橡胶输入新加坡加工，制成胶片，通过当地的洋行，或迳直输往欧美国家。他们也搜购邻近地区的热带产品（如胡椒、咖啡等）及稻米，先集聚在新加坡，然后分销各地。因此在促进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上，福建商人贡

献甚大，功不可没。投身经营橡胶转口而发财致富的福建企业家比比皆是，陈嘉庚、李光前、陈六使及陈延谦等人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长期以来，商业活动一直是福建人的经济支柱，是最多闽人从事的行业，很多闽人赖以为生。商业活动主要分批发业与零售业。

批发商经营的货品繁多，重要的有米业、土产（椰干、胡椒、甘蜜与硕莪粉等）及杂货业（布业、食品与日常用品），此外还有建筑材料、五金业、京果业及茶叶等，不一而足。

福建人经营的零售业，更是广布全岛，不论是大街小巷，城镇乡郊，触目皆是。其中以杂货店与百货商店最多。前者售卖的货品繁杂，主要是糖米油盐及罐头食品；后者经售布匹、衣饰与鞋袜等物，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此外还有售卖咖啡、食物、药材、陶瓷、水果、建筑材料及家庭器具，林林总总，琳琅满目。此外，更有沿街叫卖的流动小贩，贩卖各种食物与货品，赚取蝇头小利，过着清苦的生活。

本书第一章的商业贸易，对上述课题有较深入的阐释，有助于增进读者的认识。

与商业贸易增长相辅相成的，是航运业与驳船业的兴起，福建商人在这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自新加坡开埠后，随着转口贸易的增长，新加坡与邻近国家的货物交流越来越频密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土产（胡椒、咖啡、甘蜜与橡胶），马来半岛的热带产品，木材与胶锡，暹罗与缅甸的稻米都由船只输入新加坡。而中国的棉织品、瓷器与药物，西方国家的制成品，也由远洋航船载来新加坡，再由新加坡船只转运到东南亚各地去。远洋轮船主要由欧人垄断，而新加坡与东南亚海域间川行的航船，除了部份属于欧人资本的实得力船务公司（The Straits Steam Ship Co.）的船只外，华人也参与其盛，如十九世纪的黄敏、林和坂、邱忠坡与李清渊，以及二十世纪首二十年的林秉祥与陈嘉庚，手下都拥有可观的船队，川行东南亚各海港间，使各地物品能物畅其流。而这些船主都是闽南人。

远来的轮船航达新加坡海港，碇泊在



海港外，然后将货物卸下置于驳船上，转运码头，或沿着新加坡河上溯，储存在河岸的仓库内。至于出口的货物，也由驳船运出外港，转由轮船运往外地，驳船业船主与工人，以闽南人居多，其次是潮州人。

华人移民的涌入，也刺激了船运公司的蓬勃发展。移民开始是乘坐“红头船”南来，长路漫漫，海上波涛汹涌，狂风暴雨肆虐，险象环生，也有不幸葬身鱼腹者。迨至十九世纪下半叶，移民才开始转乘轮船。轮船船身大，可容数百人。不过，川行于新加坡与华南的轮船公司，初期都由欧人垄断。眼见经营轮船有厚利可图，也导致华商参与，如邱忠坡的万兴船务公司，拥有轮船数艘，川行于中南海域，运送移民南来。而林秉祥和丰轮船公司，拥有更多更大的轮船，穿梭于新加坡、香港、汕头与厦门的海域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移民乘坐和丰轮船蜂拥而来，是为和丰轮船公司全盛时期，获利至鉅。本书的第二章航运业与驳船业，曾作较详尽的描述。

随着商业贸易的增长，人口的激增，与城市的发展，有人手上有剩余的现金，

需要有安全的机构存放，赚取利息。有人欠缺资金，须向银行抵押借贷，借资周转，扩充业务。有些商人向外商取货，也需要通过银行付款，这一来，银行业与保险业便应运而生。

十九世纪新加坡的银行业几乎全为英资银行所垄断，碍于语文与习俗的障碍，华人无法与之交往，而华人却因难以筹足资金，又缺乏经营银行的人才与经验，久久未能创立。直至二十世纪初期，新加坡才有华资银行出现。1903年，广帮资本家创办了广益银行，但由于管理不善，亏蚀累累，十年后竟关闭。第二家是四海通银行，成立于1906年，由潮籍人士经营。直至二十世纪十年代，新加坡先后有三家华资银行崛起。它们是：华商银行、和丰银行及华侨银行，其主席、董事与经理主要是闽籍资本家，包括林秉祥、李光前及叶玉堆等人。创业以来，稳扎稳打，渐入佳境，嗣后不幸面临经济大萧条的袭击，摇摇欲坠，不得不于1932年合并，组成新的华侨银行。好不容易待至经济恐慌的阴霾消散，雨过天晴，华侨银行才转危为安，业务蒸蒸日上，直至今天，华侨银行已蔚

为最大的华资银行之一。1935年，另一家华资大华银行成立，创办人包括黄庆昌（现任大华银行黄祖耀之父）及王丙丁等人，都是闽籍人士。今日的大华银行，已成了新加坡最大的华资银行。

几乎与银行业同步兴起的，有华资筹办的保险公司。1913年成立的联东保险有限公司，创办者主要是闽籍人士。他们包括陈齐贤及李浚源等人，经营火险与海洋险。另一家华资的亚洲保险有限公司，1923年开始营业，创办人与管理人主要是粤帮人士。不过，华侨银行属下的华侨保险有限公司及四海通银行也兼营保险业。

早期的福建移民离乡背井，大都是单枪匹马，独身南来，把眷属羁留乡间，因此须按时汇款回乡，接济亲人。最初汇款与带信的任务，是由“水客”代劳，“水客”定期来往两地，执行派送工作，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酬劳。但“水客”的递送并不安全稳妥，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中叶，民信局便应运而生。民信局除在新加坡设有总行外，在中国的厦门与汕头等城市设有分行。汇款人在此地总行缴款后，民信局便向银行折成国币，购买汇票，寄送国

内分行。分行即派员按收款人地址送去，收款人一旦收得汇款后，须签名收据。民信局自然要向汇款人收取手续费。由于通过民信局汇款较安全稳妥，甚受汇款人欢迎，业务兴旺。直至1949年以后才盛极而衰。闽南人林树彦经营的侨通行，信誉卓著，堪称一枝独秀。

本书的第三、四与五章，涉及探讨的是金融业与民信业的课题。

闽南人的种植业，业绩辉煌。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期间，黄梨罐头业盛极一时，闽籍企业家如陈嘉庚、陈泰与李光前等人，投下巨资在三巴旺与义顺等地区大事种植黄梨，后来更扩展到柔佛广袤的土地去。嗣后橡胶业一枝独秀，种植与经营橡胶有厚利可图，吸引了陈嘉庚、李光前、陈六使与林文庆等闽南人在新马广事垦植，一时新加坡各地，绿树成林，胶园处处，蔚为奇观。本书的第六章即显示了闽南人种植业的光芒。

闽人的经济活动领域中，制造业构成了重要的一环。这里所谓的制造业，是指企业家投资设厂，利用简单的机械，雇用一些技术或非技术员工，进行工业品的



生产，借国内外人士消费。战前制造业的投资经营，欧人资本家不感兴趣，趑趄不前，是华人（以闽人为主）资本家捷足先登，大开拳脚，并取得斐然的业绩，催生了新加坡工业化的萌芽，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。

新加坡的制造业，大抵发轫于二十世纪初。那时期，华人企业家开始投资橡胶业的种植与加工工业，赚了大钱。尤其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战爆发后的数年间，西方航运公司的船只被征用，华族资本家如林秉祥与陈嘉庚等人经营的航船便抓紧契机，鸿图大展，营利大增，累积了钜大的财富，因此行有余力，投资创设多种工业，带动了新加坡工业的发展。

战前闽人的工厂，大小不一，规模大的雇用一千几百名员工，产量多，产品供销海内外市场。大工厂寥寥无几，它们的业主都是闽南人，如陈嘉庚、李光前与林秉祥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其他大多数的工厂都是小规模，员工只有十余人，有些甚至清一色是家庭成员。

制造品大多是将原料运往厂里，进行加工处理，便制成产品。就其性质言，可

分为以下两大类：

（一）橡胶加工及制成品：前者是将胶汁运往胶厂加入凝固剂（醋酸），压成薄片烘干，输往欧美国家，闽南人著名胶厂有陈嘉庚的谦益，李光前的南益，与陈六使的益和。后者是将橡胶加工，制成轮胎、胶鞋、胶帽、雨衣、胶管、医疗器材及各类胶制玩具等，著名的有陈嘉庚胶品制造厂及南洋公司制造厂。

（二）饮食业：产品包括黄梨罐头、食油、面包、饼干、汽水及酱油等，闽南人著名的工厂有陈嘉庚的黄梨厂、林秉祥的和丰油较厂、周子敬的康元饼干厂及杨天恩的杨协成有限公司。

（三）生活用品：家具与肥皂等。陈嘉庚与林秉祥都有经营肥皂厂。

（四）建筑器材：包括木材、砖块与水泥的制造。林秉祥设有和丰水泥有限公司。

闽籍人士制造业的点点滴滴，散见本书几个篇章，读者可仔细去领略。

马车是新加坡市面上最早盛行的交通工具，有些是私有的，也有华人经营的马车行，供公众服务。到1880年，人力车



开始从上海运来，不久即成为一种大众化的交通工具，直至第二次大战后的五十年代初才绝迹。人力车业是一种不人道的职业，有失人类的尊严，那时的人力车夫大多是兴化与福清籍的劳工，他们受尽风吹日晒雨淋的煎熬，收入微薄，生活清苦。到了战后初年，开始没落，逐渐为三轮车所取代。

二十世纪初，摩多汽车开始进入新加坡。初期的汽车，无论是引擎与外观都很简陋，不过也只有殖民地官员与富贵人家才能拥有。随着时日的推移，汽车的数目与日俱增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曾出现过有轨电车及空中有线电车，但由于铺设铁轨与装置电线的工程浩大，所费不赀，电车行走缓慢，渐遭淘汰。从二十年代开始，便由公共巴士取代。市区的路线多由新加坡电车公司所垄断。战前华人经营的私人巴士公司，以郑古悦巴士公司拥有的车辆最多，规模较大，但只能川行乡郊地区；详情见于本书第八章。

福建剧中的歌仔戏，流行于闽南与台湾，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，才流传到新加坡。歌仔戏唱词通俗，唱腔

曲调的特点是曲多白少，格律较自由，剧目多根据旧小说改编，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。1930年，有歌仔戏班《凤凰班》从台湾南来演出，风靡一时。接着有好几个戏班南来献艺。五十年代是歌仔戏发展的全盛期，闽剧团如雨后春笋，著名的有《新赛凤闽剧团》、《南艺闽剧团》及《筱凤闽剧团》等，一时竞争剧烈，剧团除了在游艺场的剧场演出外，还在中元节等传统节日演出酬神的街戏。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，街戏便逐渐走向没落，至今已乏人问津。

新加坡早期的闽南人，也带来了家乡的“南音”。“南音”的表演形式是小型乐队的清奏或清唱，以五或十人组成乐队，吹弹的主要乐器有二胡、二弦、三弦、洞箫、琵琶、长短笛、唢玉、木鱼与听锣，或只演奏乐曲，或为独唱伴奏。

闽南人的“南音”爱好者，志同道合，先后组织了几个团体，先有横云阁（1910-1930年代），云庐音乐社（1930-1940年代），每逢传统节日，便会聚集在天福宫内演奏。嗣后又有湘灵音乐社的组织，该社在丁马成当社长期间，社员人数



愈益壮大，他也对“南音”作了一些改革，使更趋完美。曾多次在本地与外国举办演奏会，深获好评。

有关闽剧与南音的细节，本书第九章提供了更多的详情。

如果说战前闽籍人士的经济结构是多方面的，大大地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，那么到了战后，尤其是1965年独立建国后的数十年间，闽人的经济活动领域更为辽阔，经济结构更多元化，经营方式更现代化与科学化，资金更雄厚，组织更严密，人才更济济，显现了闽人的富有睿智、胆识与远见，在经济领域里独树一帜，锋芒毕露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，政府为了摆脱过去殖民地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形态，锐意进行改革，重建国家经济。六十年代政府积极落实工业化计划；七十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工业，并由劳工密集型过渡到资本、技术密集型工业。八十年代以后，政府更推行“第二次工业革命”，改善经济结构，发展炼油、修船造船与电子电器等制造业。随着国家迅速的经济发

展，闽人企业家也闻鸡起舞，大展身手。生意越来越红火，资金的积累越来越雄厚，终至于形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，其中有些更发展为跨国集团。

闽人的企业集团的业务性质，以银行业与金融业为核心，其中经营房地产，分销代理、百货零售及旅馆餐室等服务业，也扩大到农、林、牧资源加工及制造业。为了避免风险，集团的业务都呈多元化，股权的掌握与人事的组织虽仍具有家族色彩，但也延揽专才协理发展业务。

在诸多企业集团中，闽人的集团最为财雄势大，著名的有：华侨银行集团、大华集团、远东机构及丰隆等。

总之，新加坡福建人不仅是最大的方言群体，也最为财雄势大，成为华社的中坚份子，中华总商会的多届会长，都由福建人充当。更难能可贵的，是福建人的热心赞助华文教育事业，南洋大学的创办，得力于福建人的倡议与推动，福建会馆属下的六校，为国家社会作育英才，赢得了普遍华人的致敬与喝彩。